

中美‘来而不往非礼也’

■ 本报特约评论员 荣民

措施,滥用世贸组织‘安全例外’条款,实质上构成保障措施,而且其措施仅针对少数国家,严重违反了作为多边贸易体制基石的非歧视原则,严重侵犯中方利益。3月26日,中方根据《保障措施协定》在世贸组织向美方提出贸易补偿磋商请求,美方拒绝答复。鉴于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的可能性,3月29日,中方向世贸组织通报了中止减让清单,决定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美方232措施对中方造成的利益损失。

那么,根据WTO规则,什么情况下一方能够中止关税减让义务?我们先来看关税减让义务。作为WTO的基本原则,各成员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谈判后形成的约束性税率具有普遍约束力,不得任意撤回或修改,并不得加征其他国内税费,旨在通过不断降低进口关税水平来促进国际贸易有序发展。尽管关税减让是WTO成员的法定义务,但WTO规则也允许在满足下列三个条件的情况下‘中止关税减让义务’。第一,有关的贸易协定允许实施中止关税减让。第二,中止关税减让遵守了正当程序。第三,中止关税减让水平与受害人蒙受的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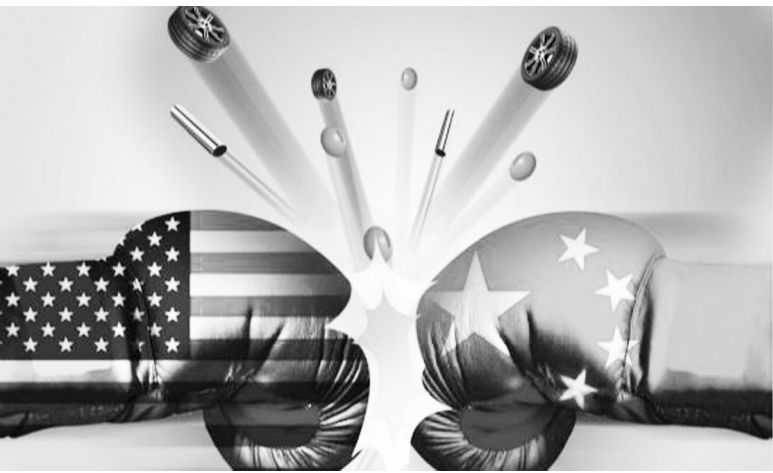
失基本相当。

根据《WTO保障措施协定》第19条规定,一方实施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如果受措施影响一方未能通过谈判达成补偿,有权通过暂停与措施实质相当的减让进行报复。据此,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中方认为,美方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采取232措施,滥用世贸组织‘安全例外’条款,实质上构成保障措施”。这一理解为中方适用《保障措施协定》第19条采取反制措施提供了法律基础。从程序上看,“3月26日中方根据《保障措施协定》在世贸组织向美方提出贸易补偿磋商请求,美方拒绝答复”,这满足了中方实施反制措施的程序性合法条件。从实体要件看,“鉴于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的可能,3月29日中方向世贸组织通报了中止减让清单,决定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美方232措施对中方造成的利益损失”。中方加征的关税水平和所涉及货物的进口总值与美方232措施实施对中方造成的损失水平基本相当,从而满足中方实施反制措施的实体性合法条件。

“来而不往非礼也”。从国际条约原则的角度来解读这句中国古话

就是‘对等原则’。随着国际条约深入全球外交、经济、贸易等各领域,“对等原则”作为一方针对另一方采取歧视性措施情况下,据以实施反制乃至报复性措施的一项原则被国际条约和各国国内法所接纳与承认。作为WTO的成员,中国决定对美部分进口商品实施中止关税减让义务是我国运用WTO规则,维护我国利益而采取的正当举措。既符合WTO规则的要求,也是具体实施我国《对外贸易法》相关规定的体现。

“合则两利,斗则两败”。这场由美国政府挑起的意在‘围追堵截’中国的贸易冲突不是始于‘232措施’,后续美方挥动‘301调查’大棒施压中国是大概率事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绝不会畏惧美方动辄使用的‘贸易’惩罚手段,一定会‘奉陪到底’!毕竟,WTO规则对于任何一个成员都既是‘牙齿’,又能是‘盾牌’。任何‘损人利己’的美梦,所有单边主义的妄想都不过黄粱一枕。所以,美方应尽快撤销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措施,使中美双方间有关产品的贸易回归到正常轨道。唯此,才能避免后续行动对中美合作大局造成更大损害。



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2018年4月2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一)对原产于美国的水果及制品等120项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关税,加征关税税率为15%;(二)对原产于美国的猪肉及制品等8项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关税,加征关税税率为25%;(三)现行保税、减免税政策不变。

这是中国政府针对美国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的232措施所实施的反制措施。2018年3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基于国家安全的‘232调查’,决定于3月23日起,对进口钢铁加征25%的关税,对进口铝产品加征10%的关税。该决定一出引发全世界对美国违反WTO规则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行为的指责与批评。

对于中止减让关税义务,中国商务部提供了这样的解释理由——美方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采取232

●连线自贸区

我国11个自贸试验区启动协同开放

■ 杨迪 袁秋岳

据新华社消息,上海、广东、四川等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于4月1日在成都启动《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发展倡议》,明确将进一步强化协同改革、协同创新、协同发展的思维,大力实施内陆与沿海沿江协同开放战略。这意味着各地的自贸区改革试验今后不再是‘单兵突进’,而将更加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

这份倡议是当天举行的2018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发展论坛的主要成果。11个自贸试验区共同倡议,把协同开放置于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大任务中,推进自贸试验区之间的制度对接、产业协同、平台共建,加强自贸试验区对其他区域的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加快打造立体全面开放、竞相协同共兴的崭新格局。

倡议还明确,协同开放聚焦制度创新,聚力现代政府治理、双向投资管理、贸易监管服务、金融开放创新、产业集聚创新五大核心制度创新体系,聚集各自自由贸易试验区力量,对重大改革任务集中攻

坚、集成突破。同时,把自贸区建设与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有机结合起来,克服改革‘碎片化’和‘单兵突进’问题,强化叠加放大效应,形成一批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制度改革新成果。

此外,各自自贸试验区还计划每年轮流举办一次协同开放发展论坛,研究确定年度协同重点,发布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年度发展报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员赵晋平认为,自2013年设立上海自贸区以来,自贸区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已经显现。如果11个自贸区能在制度层面通过联动发展的方式形成一体化的特殊经济区域,将对推动改革开放发挥积极作用。

赵晋平介绍,2017年11个自贸区新设外资企业6841家,其中以备案方式新设企业占比99.2%;实际使用外资103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1%,高于全国平均增幅10个百分点。



图为一列上海开往莫斯科的中欧班列。3月30日,由上海开往莫斯科的‘一带一路’跨境电商中欧班列货运列车在上海杨浦站发车,助力中欧跨境电商物流运输。

完善外贸政策法规 应对全球贸易新形势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3月29日下午,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钢在国际经贸形势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报告会上,介绍了对2018年世界经贸形势的预测情况。他认为,2018年世界经济增速有望超过2017年,达到3.7%—3.8%,美国经济增速大约维持在2017年的水平,欧盟经济增速可能略高于2017年,日本经济增速也有望达到新高。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也会加快,亚洲仍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非洲

和拉美地区经济增长有望加快。全球贸易和投资规模会进一步扩大。

“2018年也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这主要表现在逆全球化趋势显著、美国国内减税、美联储加息、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等。”李钢认为,中国对外开放也需要积极应对一些不利的新情况。近年来外方对我国加入WTO后表现的评价变得负面。中国和西欧技术差距正在缩小,虽然中国期待与发达国家开展技术创新合作,但美国和欧盟对此表示警惕。以往我

国被动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如今迫切需要构建自己的价值链。

面对新情况,我国仍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开放,完善外贸政策法规。在李钢看来,我国很早就有《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和《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但还没有服务贸易进出口条例,这方面需要明确可操作、可落地的依据。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近期措施密集出台,应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未来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也应进一步缩减。

供应链整合是传统外贸企业转型升级重点

■ 本报记者 孔帅

作为外贸发展新业态,跨境电商蓬勃发展,我国跨境电商商务占外贸进出口额的比例在20%左右,年均增速约为25%。在这一大趋势下,还没有转型升级的传统外贸型企业,怎么紧跟时代潮流,跳上跨境电商的快车?

“在调研过程中,有些传统外贸企业说,不转就是死,转了还是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博士后李峰在‘跨境电商发展的大趋势、机遇和挑战’讲座上说,传统外贸企业知道跨境电商很好,也想要转型,但是如何转是企业面临的问题,企业需要建立互联网思维,理解全球化的概念,注意企业的问题和行业的痛点,作出更好的选择。

我国传统外贸业务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李峰介绍说,从政策层面看,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丝路电商”成为亮点;2017年,我国与7个国家建立电子商务合作机制,与3个国家签署自贸协定,跨境电商发展的国际环境良好。此外,我国跨境电商监管过渡政策延长、税收优惠等政策都为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了机遇。在挑战方面,各国跨境电商监管政策变化太大,例如欧盟、俄罗斯、澳大利亚等都是如此。我国跨境电商监管政策处于试点阶段,需要积极应对未来的变化。

从行业发展层面看,我国2012年已经成为外贸进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外贸企业的话语权变大。作为外贸发展新业态,跨境电商蓬勃发展。挑战包括逆全球化势头的出现和我国外贸增长的放缓。

从企业发展层面看,机遇包

括跨境电商新模式的出现,例如社交电商,中国品牌得到认可,例如‘双11’。挑战包括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能力不足,人才缺乏,对互联网认知不足,市场竞争同质化严重,例如母婴用品、化妆品、医药等进口占比过大。

传统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有三。一是服务战略,整合服务供应链,满足客户需求。例如外贸服务超市广新达,通过整合外贸供应链资源,为企业提供通关、仓储、物流、认证等一站式外贸服务,大幅度提高外贸企业在整体供应链中的效率。二是客户战略,整合供应链条,打通线上线下流量。例如趣衣,一方面整合上游服装供应链,为服装品牌提供周转效率,降低货品流通成本;另一方面为外贸小店提供物美价廉的品牌服饰,并输出管理标准,提升留存率和复购率。三是品质战略,树立品牌意识,增强产品竞争力。例如奥雷士在外贸整体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曾实现出口大幅度增长,这与注重研发和自主知识产权密不可分。

李峰表示,传统外贸企业可以分成两类:服务型和生产型。服务型外贸企业的转型需要依靠互联网,而升级最重要的还是整合供应链。服务型外贸企业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高,供应链长,而跨境电商不存在代理商和分销商,且可以直接与消费者沟通,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生产型外贸企业在短期内可以‘借船出海’,实现营收,但长期仍需打造品牌,研发是此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品牌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精耕细作。

贸易摩擦倒逼中国强‘芯’健体

■ 本报记者 张凡

额的3.8%。

有分析指出,中美贸易摩擦中,如果美方所作所为引起我国在芯片行业对其报复,那么这一美国对华出口最多的行业将遭受毁灭性打击,当然,这取决于中国能从本国或其它国家找到替代品。虽然从这样的分析中看我国似乎是掌握了很大的主动权,但依然掩盖不住我国芯片长期依赖进口之痛。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接受《中国贸易报》采访时表示,我国芯片一直依赖进口的原因,除了与我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相对较晚有关外,也与半导体设备行业门槛高,当前正处于寡头垄断局面有关。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一直受到各方面种种限制,导致出现高端芯片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这给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制造业做大做强,迈向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阻碍。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芯片就是很多高技术产业的粮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告诉记者,欧美、日本、韩国企业经过几十年的技术积累,已经基本把芯片设计的核心技术掌握在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

形成了对华垄断的态势,而中国在这些领域和核心技术上的投入,则到了改革开放后很多年才跟上,这为我国高技术领域发展带来了不少挑战。在芯片领域,“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更多的是赶,还没到超的阶段。”白明说。

“这次贸易摩擦不但有利于刺激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相关国内企业深入研究和熟练掌握国际经贸规则,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宋清辉表示,目前,中国的芯片行业面临着三大机遇:一是自2010年以来,全球芯片行业发展进入新一轮高增长周期;二是芯片国产化需求迫切;三是国家重点扶植芯片产业。与此同时,我国芯片行业也在遭遇巨大的挑战,芯片人才缺口十分严重。长期以来,中国芯片企业在发展动作上,海外并购频繁,凸显我国相关行业发展的强烈愿望。“我认为企业通过国际并购等手段,获取相应的技术无可厚非。但是,只有逐步消化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才能够更好地为我所用。”

“芯片在中美经贸关系中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领域。美国心态可用可

中国未履行入世承诺？不得不提利益考量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3月29日商务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有观点认为中国市场开放程度不及预期,未切实履行加入世贸组织降低关税的承诺,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回应说,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认真、全面地履行了各项加入承诺,市场不断开放。高峰介绍,在履行世贸组织降低关税承诺方面,中国关税总水平已由加入时的15.3%降至9.8%,实现了对世贸组织所有成员的承诺,达到并超过了世贸组织对发展中成员的要求。如果考虑到贸易结构的因素,中国实际的贸易加权平均税率仅为4.4%,已经非常接近发达成员。除了履行加入承诺以外,中方还根据《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的结果,进一步降低了201项信息技术产品的进口关税。为进一步开放市场,近年来中方还主动降低了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

“2006年之前,外方对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表现的评价是正面的,但2006年以后,外方认为我们不仅没能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而且还有倒退。”《中国贸易报》记者听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钢介绍说。

一方面是中国近年来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另一方面却是外方在近年来对我国的入世表现颇有微词。怎样看待这种矛盾的现象?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副研究员李春顶告诉《中国贸易报》记者,在WTO内发达国家声音较强,WTO较多反映它们的利益诉求。“2006年之前发达国家的贸易处在正常发展阶段,对中国的评价也比较宽和;2006年以后,随着中国入世15年的到来,各国对中国入世进行评价,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它们竞争的加剧,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压制中国,贸易保护主义声音也明显提高。

不过李春顶也指出,我国的营商环境也处在调整升级过程中,存在诸如劳动力等成本上升、外资银行在华经营不理想等情况。“一些外资企业有自己的不满并且游说本国政府对中国施压,美国对华‘301调查’背后可能也有一些美国企业为美国提供了材料。这值得我们多留意。”李春顶说。

怜悯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来形容。白明说,美国在对华出口芯片的问题上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美国希望出口大量芯片到中国,与韩、日等国争夺市场,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中国在芯片领域取得大的突破,限制高端芯片出口到中国。因此,让美国企业的芯片成为中国市场的主流,取决于美国的態度。如果美国芯片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对于中国下游厂商而言,扩大了他们的选择范围,但由于美国对高端芯片的限制,使中国相关产业只能在狭小的、局部的空间进行发展。对于上游厂商而言,会使其更加重视发展,加大创新和投入力度。

中国还处于迈向制造强国的起步阶段,要埋头苦干更要开放包容。TCL的李东生在两会期间曾说,中国芯片产业应与世界深度融合,比如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加快与沿线国家的创新合作,TCL就准备与‘一带一路’沿线的以色列等国进行技术引进和创新合作。

白明也对此持相同看法,他表示,芯片相关产业要想取得大的突破,最好的方法便是中美双方联手共同研发、制造,实现双方共赢、利益共享的目标。